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世務之肆應 ——以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為觀察核心

江寶釵*

摘 要

本文嘗試討論臺灣傳統文人之中，頗具代表性的連橫，他一生所投入的傳播事業：任報刊筆政、創結詩社、開辦書局、設立漢學研究會，發行期刊等等，檢視殖民地政府的政策、現代化進程中的臺灣，如何激勵他在這些漢學傳播活動的踐履，造成他的挫敗，又如何代表了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肆應世務的方式，從而反映出臺灣被割據予日本治理後深刻的社會變遷。

關鍵詞：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連橫、詩薈、雅堂書局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 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Taiwanese Literati's Responses to Contemporary World Chang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of Lian-Heng's Han-Xue Propagation Activities

Chiang Pao-C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fe and work of Lian Heng, a significant figure among Taiwanese literati. Lian Heng's lifelong devo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literature includes work in editorial jobs for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the organizing of poetry societies, the opening of bookst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rganizatio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eriodicals. To what extent did the polici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affect his practices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 and what obstacles did this create for him? How were Lian Heng's circumstances representative of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their ways of cop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se question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Taiwa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Lian Heng, Shi-Huey, Ya-Tang book stor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世務之肆應 ——以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為觀察核心

江寶釵

前言

連橫（1878-1936）係臺灣接受完整漢學教育的一世文人。¹他的一生歷經乙未之變、臺民抗日，及日本據臺後於 19 世紀末期在島內推動的現代化、同化，以迄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各種文化施政（諸如減縮書房、廢除漢文課）等等階段。在這些階段裡，他投入相當多元的漢文化的各種傳播活動：任筆政、創詩社、開書局、設漢學研究會，辦期刊等等，幾乎囊括當時臺灣傳統文人所從事的文化活動類型，只除了他並未成為地方自治的管理階層。是故連橫所投入的漢文化事業，可以視為渠以及其同時代朋儕因其所學以肆應世務的表徵。

這些肆應世務的方式，經常被學者視為「反日本化」的一環，與當時日本政府所全力推動的「日本化」形成強烈對比，而在臺灣島內產生劇烈的文化衝突。特別是在漢文的教育方面——此一牽涉世代傳承與民族文化認同的問題上——連橫的作為，可以謂直接與國家機器短兵相接。有趣的是，雅堂書局開幕之際，《臺灣日日新報》幾度為之報導消息、辦理徵詩活動等等，種種跡象都顯示連橫與日本報業及政府當局關係良好。而雅堂書局號稱販售漢文圖籍，卻又代理總督府在南洋的購書。如此，看似反差兩種現象何以能同時共存於連橫的傳播事業當中？或者，反過來說，連橫何以熱心於這些漢文化的傳播活動？抑或是，我們應該從那一個角度來觀看、

¹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NSC96-2411-H-194-028）的部分成果；文獻與論述獲得柯喬文、謝崇耀兩位男弟的協助。特別是崇耀在漢學研究會的觀點上，給予我頗多文獻的支持與觀點的啟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教我重新思考持論，做了頗多表述性的改變與補充，凡是皆在此謹致謝意。

思考連橫的相關作為？

連橫等臺灣傳統文人所從事的活動，多與印刷現代性相關。如果民族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之產生，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所說的，係源於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modernity）過程當中的一次深刻變化，而印刷資本主義現代性正居於關鍵地位，透過操作書報出版，為形塑身分認同的重要方式，則連橫暨其同時代臺灣傳統文人所從事者，其過程與效果如何？如此，又產生何種意義？反映了怎樣的個人處境與時代問題？

凡上述種種值得探討的課題，為本文所亟欲解答的要務之一，以提供可能的學術視野，分從不同面向來加以闡述連橫的傳播事業。至於其認同問題，雖然也會偶有涉及，由於牽涉更廣，將另文討論。

一、世變下傳統文人身分的質變與調適

1895年，日本正式領有臺灣。遭逢世變的臺灣傳統文人，他們如何肆應世務？在這裡，筆者擬自黃美娥對張純甫的分析為例，來展開對話。黃美娥以張純甫提倡孔孟學術，同時，收藏古籍，因而可被視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謂「拾荒者」、「收藏者」的近似類型，茲將其觀點引述於下：

班雅明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後，文明漸漸侵佔、控制人的感覺與意識，人為求保住自我的主體，會從原本介入的公共的外在世界，轉向／還原為「內在世界」；以班雅明自身的經驗而言，其個人的「圖書館」便是「內在世界」的居室化。而這個「圖書館」的隱喻來源，是從現代都市中「拾荒者」的精神啟發而來，拾荒者在大都市中收集每日被棄、被鄙的垃圾；藉此，自己也化身成了一個「收藏者」，「收藏」是一種「繼承」的態度，是現代世界生存者的抗爭與慰藉，當他浸淫於其個人圖書館時，在傳統與充滿先輩氣息的事物中，他更發現收藏是一種「存在」方式的構築，「過去」可以成為拒絕虛無、混亂的「現在」的壁壘。因此，就班雅明而言，「收藏者不僅夢想一

個遙遠的桃花源，同時還夢想一個更好的境地。」相近似地，張純甫的「守墨樓」藏書，乃至於其人終生投入的漢學園地，正是用以抗拒現代文明的桃花源，他感受到與孔孟儒道先賢的精神同在。則如此，張氏不合時宜的「復古」思潮與「收藏」的遺民意識，在現代的時間情境中，無寧具有特殊意義，流露出綿綿不盡的時間鄉愁。²

不可否認，黃美娥的這段論述，頗具原創性，惟相對地，亦引導筆者反思若干問題：臺灣傳統文人肆應世變的做法，是轉向／還原為「內在世界」、抗拒現代文明嗎？藏書、漢學園地，正是用以抗拒現代文明的桃花源嗎？「復古」思潮與遺民意識，在現代的時間情境中，只是綿綿不盡的鄉愁嗎？底下，筆者擬逐次說明：轉向／還原為「內在世界」，並非中國的文人傳統思維；其次，筆者將進一步論證，這樣的轉向／還原，固然有其抗拒現代文明的動機，卻無法形成實踐，而反過來，在「現代性」的強勢滲透之下，當時臺灣的文人反倒不得不參與其現代化進程；此外，渠等對漢學園地的投入，並非只是遺民意識的收藏，而是具有為世所用的意圖，以及保存漢文價值於當世的思維寓寄其中。

（一）「內在世界」的閉鎖與挫折

在筆者看來，臺灣傳統文人如張純甫等與班雅明所分析的西方現代文人，他們的身分和位置不盡相同。對於西方現代文人而言，他們所嚴肅面對的，是現代性逼仄下的社會處境變動問題，亦即，面臨「異化」的危機意識，所採取的自衛措施；而像張氏這樣的傳統文人，他們不僅身臨現代性帶來的世變，他們還懵懂於知識分子角色扮演的變動，多數胸懷為世所用的心願，抱持著儒家修身見於世、安居天下平的冀望，要使生民各安其位、各適其生；他們並未發現知識分子的階層成素已經改變。此外，他們還要面對鼎移的現實，接受殖民政府的統治。也就是說，臺灣傳統文人，痛遭世變之亟，他們同時面臨現代性的社會變動、文化翻轉，以及殖民性的政治更易。對此，他們大多有無可如何之感，這種情緒的諷詠比比皆是，在此地

²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頁 87-88。

略以連橫與林幼春的贈答詩做為說明。幼春與連橫友善，他贈連橫的一首詩裡³，寫道：「按劍隋侯世莫前，干將補履亦徒然。人間真有禽填海，天上原無蠹化仙。歷劫神鰲淪禹績，忍寒老鶴話堯年。孤山一掬冰霜淚，不敢憐君祇自憐。」連橫欲和其韻，構思不得，他自己說，當時就隨意寫了一首律詩⁴做為回答，這首詩是這樣寫著的：「黃金何處築高臺？已死燕昭老郭隗。射虎屠龍原易事，揆天闢地有奇才。一生肝膽酬巾幗，千古文章保劫灰。三十功名塵與土，且持尊（今作樽）酒對寒梅。」幼春詩的首句以隋侯珠為譬，隋侯珠難得一見，珍貴無比，但它投入黑暗中，炯炯發光，不但沒有人敢拿，還按劍斜視，說明美好之物反而容易引來疑慮。干將鑄天下第一流的寶劍，在現實生活中，拿來補鞋子，遠不如一銖錢就買到的錐子好用。林氏此詩，表達物不能適其所用的悲哀，譬擬其個人處境，最後只能自慰人間功名無非塵土，何如在寒梅樹下飲酒終生！而連橫的回應，則以燕昭王已死，郭隗老矣，就算是幼春智略足以射虎屠龍，文章的光芒照耀天際，但乙未之變，一方面是漢文化傳統遭遇前所未有的災難，一方面是展現才學的個人文章，也已化為灰燼，為之奈何？這豈不正是「三十功名塵與土」的寫照？而樽酒寒梅，更呼應幼春詩末的「孤山一掬冰霜淚」，顯示雅堂亦有意縱酒隱居，成就志節，以保有個人主體性的逍遙自由。

如上所述的縱情詩酒、隱逸山林（或者未提及的沉緬女色）等等作為，沒有一項逸出中國古代傳統文人肆應亂世的牢籠，卻因著當代政治環境的改變，重現為臺灣傳統文人的心情與生活的形式。這些形式，並非前揭所謂「閉鎖、頹廢與收藏」的身體所能逐一收納。

消極地看，這些都可以謂之頹廢身體敘事。然而積極地看，縱情詩酒對於自我情志的發抒，特別是詩作的書寫，不無裨益，在漢文化中，本就具備「立言」、以文章「傳之無窮」⁵的想像。隱逸山林，與天地為友，出入六合，遊乎幽冥，反而是

³ 此詩或題「柬雅堂」，收在林資修著，《南強詩集》（臺中：林培英，1964），頁29；又或題「贈連劍花」收在賴柏舟主編，《鷗社藝苑》第4集（嘉義：鷗社印行，1955），頁130。

⁴ 這是連雅堂寄給林幼春的詩，收入《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111，詩題為「酬南強」。

⁵ 曹丕，〈典論·論文〉謂「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蕭

世務的完全放下，身心的絕對敞開，如郭象《莊子注·序》所謂的「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⁶，在漢文化價值中自成系統。即便是沉緬女色，最接近閉鎖、頹廢的行徑，但這裡面，也有消費女性，排解欲望的功能。這樣的肉身，向來是在世變之際，漢文人對抗新統治階層的手段；而遺民的主體心靈，備受故國不再的那種強烈的歷史失落感的衝擊，使他們在毀壞的天地裡，益感到時間的荒涼感。他們遂沉浸於往事的緬懷之中，渴望重返美好的往日，遺民詩人反而因此萌生了一種棄世棄民的「倫理承擔」⁷。在這裡，我們想延伸此一倫理承擔的意含，此一心境，絕不是僅止於歷史記憶的封存而已，而是從國故的反覆溫存中，摩挲多義，展現新詮，並且從承載自我心靈的創作中，成為文化大爐中的新／薪火，以「繼往聖絕學」的姿態，使文化跳躍政治的裂變，持續展開，等待著與很久很久以後才會出現的「來者」產生對話，而很多甚至就沉沒於時間的洪流之中，永不為世人所知曉。而這種不論個人死生榮辱，但教歷史文化生生不息，這樣的承擔所展現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地與時間、政治競賽的風骨，正是遺民詩無意中展現的悲壯美學：「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⁸當然，這其中亦不無伴隨著「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⁹的寂寥和自憐。

（二）「外在世界」的面對與敞開

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1），頁720。

⁶ 所謂神器，指一己自由的心靈；所謂獨化，意思是萬物都是獨立的，自己產生，自己變化；而玄冥則指無知無識、彼此冥合的神秘精神境界，亦即所謂「玄同內外、彌貫古今」、「無是無非、混而為一」的至上境界，因此「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可以說就是一種泯生死、齊是非的精神上自我解脫的「逍遙境界」。

⁷ 關於遺民意識的論述，參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04.07.15-16），頁87。倫理，指道德，行為的準則（standards of behavior），為了為所當為，不屈服於利害，並接受一切後果而無所悔，便係此地所謂的「倫理承擔」。案：解釋為筆者所加，不見於王氏原文。

⁸ 此為杜甫〈後出塞〉五首（其二），「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見[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檢索系統：<http://140.138.172.55/tang/Database/index.html>。

⁹ 同為杜甫詩歌名句，〈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見[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檢索系統：<http://140.138.172.55/tang/Database/index.html>。

前述的縱情詩酒、隱逸山林、沉緬女色，卻都不足以為當下積極用世之憑藉，而必須求諸其他作為。不少遺民詩人在擁抱文學知識、浸淫於其個人圖書館以消極抗世的同時，卻也進行著結交同志，迎合當道，發表於報刊，出版於圖籍，以販售牟利的積極行徑。這種種與「外在世界」交相利的態度，並不是班雅明所說的從原本介入的公共的外在世界，轉向／還原為「內在世界」，反倒更像是傾內在世界上所有，而置身於公共的世界。他將以之獲得聲名利祿，因為他的文化養成正是教他在現世中尋找自我實現的道路。類似張氏的傳統文人還有連雅堂。雖然，對於不斷在變動中的現代性，在變動中消逝的「舊物」——包括科舉功名，以及消失中的鄉俗社會、嶄新的時間意識、迎面而來的科學技術、市民社會……等——都使他不安，於是，對過去的收藏與追念給予他「不變」的感受。藉著空間與舊物，他在勢不可擋的現代化過程中所帶來的個別性的失落裡，留下生活的踪跡，在公共性中注入私密性，隱匿個人的玩賞，而能夠在不斷遭際新事物時，快速地對之做出反應¹⁰，成為他在現代世界中的抗爭與慰藉。

但這樣的收藏之下，他仍然必須加盟資本主義，他的書寫、印刷、出版事業即現代資本主義中的一環。也是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這本廣為徵引的名著裡，班雅明便做了這樣的分析：隨著報紙越賣越便宜，越來越依賴廣告，它被迫要以日新月異的面貌吸引各種各樣的讀者，必須每天填滿各種各樣新奇的專欄，「純文學」、連載小說遂應運而生，甚至是評論文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也只是報紙中的一個欄目而已。是通過報刊專欄，文人在資本主義市場裡占據了一席之地，獲得他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這時候，文人也不過是一個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的人。他同這個時代的關係，係由資產階級的市場文化決定的，而街頭小報和專欄文章作為這種文化的先驅。「急迫的需求和鉅額的收益兩者一同造就文人的地位，也就是說，文人他的訂貨性質和他的產品的內在規律已暗示了這個關係在他與他人，他與作為同行和顧客的大眾的關係中展現出來。」班雅明以為，文人依賴這種關係一如

¹⁰ 這個語詞當然只是一個尖新的譬喻。本段的了解參考了王才勇的序，《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同時參考第一單元「波特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中的第二章「休閒逛街者」，頁 5-31、33-65。

「妓女依賴喬裝打扮」。在企劃、撰稿、刊登、被閱讀，他們發展出一種節奏，這個節奏必然是支配整個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節奏，它與隱隱從工廠傳來的印刷傳送帶的節奏同步，而資產階級新聞出版界的天才們，「早在機械應用之前就已在咖啡館裡適應了新聞服務的節奏」。¹¹以上這段話隱括了張旭東對班雅明的了解，班雅明對於文人與資本主義出版現代性的觀察，說明了收藏、閉鎖並非文人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唯一關係。對此，班雅明並沒有一定形容的語詞，此地，筆者擬相對於閉鎖一面，稱之為敞開。

之所有此一想，是因為根據筆者的理解，班雅明延續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對現代性的描述，經常依違於是否之間，「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¹²；現代生活「在光亮、灰塵、歡樂的同時，貧困和醜陋像傷疤一樣嵌入現代生活的眼簾」；「現代生活在他筆下，有時像田園詩，有時則是反田園詩，由是產生張力」。正如波特萊爾對班雅明的啟發，這些屬於波特萊爾的敘事，正好可以用來思考班雅明的收藏的另一面，這便是「敞開」。而班雅明所描述的「敞開」——文人張臂迎向現代性，正係文人被迫與社會同步，配合報刊現代性的展演，其過程實係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下不得不做出的措施。在此，使用此自尋新解的「敞開」一詞時，筆者意欲指涉的，不僅為臺灣傳統文人遭際殖民政治下資本主義出版現代性的反應，更要回應傳統中國文化裡知識分子立身的理念、處世的方式。

用此以思考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處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在表面上，張純甫的身分是傳統文人，事實上，他處身在一個現代性的碎片無所不在地充滿著的世界裡，那個他賴以立身的傳統環境已經不再——一方面科舉做官、直隸中央皇朝，依賴俸祿維生，一方面繼往聖絕學，為天下生民立命。他們的生計已經必須由「資產階級的市場文化決定」，他也只是一個出賣勞動力換取報酬的人¹³。他的文人身

¹¹ 張旭東，〈譯者序：班雅明的意義〉，收於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臺北：臉譜出版，2002），頁36-37。

¹² 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628。

¹³ 張旭東，〈譯者序：班雅明的意義〉，收於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

分來自他的書寫、發表與交換等等作為，他沒有理由，也無所逃遁。於是，他所收藏的圖書，他的內在居室，在傳統文人的思維裡，成為覆巢之下的危卵。連橫在〈櫟社席上有懷林癡仙賴悔之二兄〉裡說的：「劫火圖書共陸沉，清秋風雨苦相侵。」圖書的毀壞，代表著道統在世變中的瓦解，也隱喻過去他用以建立社會生活方式的消逝。已毀的書毀矣，而未毀的書亦無所用矣，則應當如何？這是傳統文人所面臨的共同困境，解決之道便只有重新去尋找圖書的用處，亦即必須敞開給「個人珍藏閱讀，或者在他開設的『興漢書局』販售」¹⁴，或者化身書訊在報刊發表，才能女媧補天，彌縫傳統文人的失落，重振新聲，尋找到那個截然不同於已往的社會生產與生活節奏。

除了圖書，黃美娥將「孔孟儒道先賢」視為是張純甫所繼承而發揚的內容，並以此為維繫道統、抵抗殖民統治的一種方法。筆者所見，與此亦有不同。由於儒道，亦正是殖民政府所發揚者，這中間產生一含糊的空間：張純甫之闡揚儒道，有無可能係對殖民者的回應？還是張純甫利用殖民者之倡議儒道，以保存漢文化之儒道？孔孟雖然力倡夷夏之辨，但夷與夏的界線建立在「文化」意識上的認同，卻很容易為「治世」——對「政治秩序」的渴求——所跨越。「德以來服」意謂著有德服人者自然可以獲得統治權。這樣的觀點不免經常為異族所用，作為統治中國的主要根據，元、清兩代外族之敦崇儒學已提供明證。從這個觀點看，如川路祥代的研究所表明的，孔教是臺灣殖民主統合文化，協商教化的一環¹⁵，與改造吳鳳故事如出一轍，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因為對於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反對力量，說服他們殖民主有「德」，有能力提供穩定的政治秩序，正好用以美化殖民政治力，進而同化被殖民者。毋庸諱言，張純甫的「收藏」是一種「繼承」的態度，但其所繼承的遺產，卻無法擺脫殖民性的滲入，甚至也不完全是過去的、傳統的，如同孔孟學說，就與

情詩人：論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臺北：臉譜出版，2002），頁 36-37。

¹⁴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頁 90。

¹⁵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 90。

日本的孔教傳統結合，從傳統的延伸進入日治的當下，仍然是一則不得不向殖民者敞開的進行式。

回顧日治時期，以「閉鎖、頹廢與收藏」作為臺灣遺明文人的殊異的身體表徵，從而推導出殖民性／現代性／本土性交相頡頏、抗爭後的文化隱喻系統，確實揭示了一個重要的面向，然而要判斷其人獨特的認知世界以及與世界交往的身體形式，卻可以有不同的思維。

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與任何一世的傳統文人都不相同，除了具有時不我與的感知結構，他們還面對著強大的殖民主的國家機器與無可拒絕的現代性進程。因而，在殖民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之下，這些靠在世變的岸沿而成為棄才朽木的無用文人（黃仲則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相與倡結詩社，詩酒酬酢，揚挖「風雅」，在「現代時鐘」所帶來的時間意識中¹⁶，緬懷燃香擊鉢的計時方式；他們維持詩榜的書寫，吟哦朗唱的形式，形成一個小社會，供養自己的文化，甚至意欲發展為地方社學的功能，以民間學校的方式，維繫「民俗盛衰」。

何以「民俗盛衰」如此重要？余英時引用荀子所謂「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¹⁷指出「士」的政治的和社會文化的功能。他們不只透過「鄉舉里選」和隋唐以下的科舉制度，成為整個官僚系統操縱者，國家的管理者；同時，他們也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日治之初，日府採取以漢制漢、籠絡利用的政策，不僅形式上運作饗老典、頒紳章，使之保留「鄉舉里選」的榮耀，以及過去知識分子在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的地位，並且透過更實際的措施，將之納入基層行政和治安組織之中，而以各地具「家世族望」的士紳或擁財貨的富豪優先，建構臺灣社會新領導階層，取代清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新建的領導階層可以藉其地位獲得地方資源，舊的社會領導階層家族不僅延續其地方「權力家族」的地位，甚至更加提高其地位。清代因為科舉失敗無法進入國家管理

¹⁶ 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¹⁷ 余英時，1905年科舉廢止後，士大夫被學有專精的技術性知識份子取代，開始朝向邊緣化，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康有為、梁啟超同為戊戌變法時代的核心，而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圍。〈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25（2003）。

階層的吳德功成為參事，並透過貨幣的徵集，成為銀行董事，成功地將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¹⁸由是，家世族望成為收編的根據，餘者如學校組織由日府控制，地方鄉約被變造為保甲法，則臺灣文人可堪用以維繫民俗盛衰的方式，極其有限，類學校組織的詩社、漢學研究會，或者是提供閒暇閱讀進修的書籍出版。

臺灣傳統文人在詩社這種小社會內部的往來不足以維繫「民俗盛衰」，為顯而易見。而他們所能運用的工具與策略如前所述，並無太多選擇，於是，他們或者開設書局，或者登上報刊專欄，或者成立漢學研究會，皆係在大時代的局限下努力從小社會中向大社會「敞開」的方式。

二、知識生產閾限的跨越與顛躓——報刊與書局

在日本殖民地政府致力於臺灣的現代化、並以現代化同化臺灣人的政策下，臺灣傳統文人投入報刊、書籍的出版，乃至進行詩歌、小說等文學知識的生產活動，其實都很難不視為對殖民現代性一種敞開的方式。另一方面，日府也對臺灣人的知識活動實施嚴格的監控措施。若是之懷柔與高壓二路並進，一般人咸以為主筆政、創書局為連橫的生涯成就，就有了重新檢視的必要。他如何從事既被鼓勵又被監視的漢文知識生產活動？他的實際態度為何？其經過、結果如何？又代表了怎樣的意義？

（一）摘下報刊漢文部筆政的桂冠——檢視連橫的筆政生涯

連橫積極於漢文化傳播之經營，日人創刊《台澎日報》於臺南，他任漢文部主筆（1899）；《台澎日報》與《新聞臺灣》合併改組為《臺南新報》（1903），他仍擔任漢文部主筆；又任中部《臺灣新聞》社漢文部。

連橫赴廈門，亦主《鷺江報》（1902）筆政，未幾，又創辦《福建日日新報》

¹⁸ 江寶釵、李知顯，《全臺詩話：瑞桃齋詩話校注》導論，〈世變下吳德功的學思轉折——一個奠基於瑞桃齋詩話的考察〉（高雄：復文書局，2009），頁17。

（1905），撰寫政策、時政、社會等相關的新聞稿。他也參與《三六九小報》（1931）的編輯，並連載「雅言」。他在報刊筆政的角色上，係處於一種怎樣的位置？

謝雪漁以為，報刊係一條提高國民性的利器，並漸進於文明的道路。他說：「捨教鞭而揮禿筆，為我臺民開樂閱新報之美風，喝破舊時陋習，以漸進於文明之域，庶幾償此素願焉。」¹⁹報刊可資提高國民性的觀點，在連橫身上獲得印證。從事報務的經驗，開拓了連橫的視野，使得他對時務與世務的了解，深刻於一般人，而能掙脫傳統文人的某些局限。他對如留聲機、印版、自來水等現代器物之考釋，以及他對現代思想如法政、東西科學考證的折衝論辯，都表達他對當代知識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連橫對自己弱冠開始即「出乏報務」擔任筆政的二十餘年生涯，相關評論，卻只有「所往來者，多屬一時之士」²⁰寥寥幾句話。在他的詩中，也罕有提及。與謝雪漁不同，連橫頗不安於「筆政」的角色，有幾次的歸去來。以《臺南新報》為例，他參與的時間為 1906-1907、1914-1918，時間不長。何以故？這時候，也許我們應該從報刊的另一端——相對於閱聽人方面求解。

在傳播的過程裡，報刊的定時發刊，閱聽人的經常性閱讀，有如一種儀式，使得閱聽人產生所謂「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形成風潮，「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²¹，民族想像便藉上順暢地得到散布。殖民政府藉由其控制的三大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新聞》，與《臺灣日日新報》，發送予臺灣閱聽人被過濾後的信息，長久後，消除其自我民族意識，強化殖民政府所欲推展的共同體想像。以是，他們處於被殖民政府教化「俘虜」後的心靈狀態，形成了一種「思想上的殖民化」（the mental colonization）的認同現象。這或可以解釋連橫與日本官方的關係良好，他所主筆，有兩種即前述官方的三大新報。但是我們也可以說，被俘虜的並不是所有人的心靈，而這些心被俘虜者也不是全部的心靈，因而，不只是某些擁有省思能力的「被統治者」（尤其是文人），仍保存著源自於深層的自覺意識，或可以視之為異質；即便是沒有自覺意識者，也會

¹⁹ 謝雪漁，〈入報社誌感〉《臺灣日日新報》2051 號第 3 版，1905/3/7。

²⁰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60。

²¹ 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頁 xii。

因為他們舊有的文化程量的植入較深，而處處呈現出一種無意識的反抗，故就此而言，他們的心靈狀態或可以謂之為「受制約」（卻不是全面性地被俘虜）的狀態來加以形容，也可以用自我的斷裂予以表述。連橫或可以歸類為後者。然而不論是以上一種狀態，都不會被殖民者純化，也就是未被同化的異質永遠存在。

逝者已矣。理解這些蠢動於文人內心深處的異質，仍需自他們的行動或書寫爬梳。就連橫這個個案而言，主持新報筆政卻不能滿意於自己扮演的角色或者為尋繹其異質的方式之一。連橫前後兩次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筆政的具體實績為例，以目前殘存的資料所見，可得如下：其一，《臺南新報》「漢文欄」曾經對傳統詩界「擊鉢吟」提出批判，「反對擊鉢吟之非詩也」²²，而引發櫟社詩人如陳枕山等在《臺灣新聞》「漢文欄」上反駁，爆發臺灣文壇第一次筆戰。²³其二，「大井頭」在臺南州治市區西定坊²⁴，為臺南最古之跡，既可能是來臺之人登岸之處，又相傳太監王三保曾於此井取水，或又說是荷據時期為防「赤崁樓」著火所掘，要之，「大井頭」係珍貴的文化遺產，日治期間於市區改建時，議填之，連橫撰文力陳不可，始得保存²⁵。其三，某年秋，雅堂在漢文版，闢「赤城花榜」，遴選十美，臺南李蓮卿（1886-1901），年纔十五，為冠軍。越年五月十六日，李氏病歿，雅堂傷其遇，為賦悼念李校書七絕十首，和者甚多，竟成悼蓮卿一帙。²⁶這幾件事，以筆者目前查考的資料，竟是連橫主兩新報筆政之可道者。

此外，連橫主筆政的《鷺江報》又是中國地方報紙。他所創辦的《福建日日新

²² 「二十年前，余曾以臺灣詩界革新論登諸《南報》，則反對擊鉢吟之非詩也。《中報》記者陳枕山見而大憤，著論相駁，櫟社諸君子助之。余年少氣盛，與之辯難，筆戰旬日，震動騷壇。林無悶乃出而調和。其明年，余寓臺中，無悶邀入櫟社，得與枕山相見。枕山道義文章，余所仰止。而詩界革新，各主一是，然不以此而損我兩人之情感也。」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 294。

²³ 林淇瀋，〈「副」刊「大」業：臺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初探〉，《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麥田，2001），頁 77-94。

²⁴ 今臺南市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民權派出所對面）。

²⁵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大井頭」最終仍不敵都市更新的需求，於 1964 年，為拓寬民權路而拆井欄覆鐵蓋，成為柏油路面上「D 型」標誌之遺蹟。

²⁶ 蔡相輝，〈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收於楊雲萍、盧嘉興著，《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 207-222。

報》（案：應即《福臺日報》）報館竟被清廷封閉，他遂返台。他有一首〈攜眷歸鄉留別廈中諸友〉記載當時的心情：

蘇海韓潮湧大觀，三年報界起波瀾。文能驚世心原壯，力可回天事豈難。地上雲深龍戰血，空中風勁鷺傷翰。他時捲土重來日，痛飲高歌鼓浪山。²⁷

連橫所說的報界波瀾，一說是他的抵制美約得罪當局，一說是經營不善，導致報館關閉。以筆者考之，或兩者兼而有之。連橫辦此報，曾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募款，可見其主要經濟來源，為捐贈，而成效有限²⁸，其經營困難，或為事實。但導致關閉的直接原因，則另有曲折。根據時人的說法，連橫主張清廷不應與美國締不平等條約，以致與清廷的意見相左，很可能在清廷、美國的兩重壓力下，失去經濟來源。²⁹「文能驚世心原壯」，這是連橫對自己的學問的信心，他懷抱著捲土重來、有所作為的壯志，正映照出現當下的蹉跎無所成就。無論如何，在臺灣或在中國的報刊筆政，兩者都使他難以有所作為。

²⁷ 連橫，〈攜眷歸鄉留別廈中諸友〉，《劍花室詩集》，頁 94-95。

²⁸ 而〈『福臺日報』之難成〉的報導裡，原招募股本按定貳千股，每股五圓，合計壹萬圓。「然連氏招募雖殷，奈廈商巨腹輩，慳囊緊閉，恣者寥寥。故現計募定之實額，尚不滿參百元。如林某某輩，每人僅認十股，為五十元。似此開通者，尚畏首畏尾，何論於守財奴，不知報帑為何物者！安得不見招募章程，幾如遇政府科派軍需，便蹙額綳眉，哭貧哀困，絕力馳去耶？然則『福臺日報』之誕生，不亦遙遙無定期哉！」本刊：〈福臺日報之難成〉，《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2465 號，1906/7/19，頁 6。

²⁹ 參考本刊：〈橐筆南遊〉，「臺灣南文學連雅堂氏，去歲僑寓鷺門，創設福建日日新聞報社。因議論與清政府反對，以致不安其居。」《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2302 號，1906/1/15，頁 3。相關的記載又見「拾碎錦囊」（九十九），謂臺南連橫「創立《福建日日新報》，大張民族主義，八閩民氣，為之一振。乙巳四月，在廈倡議抵制美約，登堂演說，觸怒美領事，照會廈道，欲封報社。雅堂不屈，謂言論自由，吾人天賦之性質也。其文名逐【作者案：應為遂】震動一時。」參考本刊：《臺灣日日新報》2259 號，1905/11/11，頁 3。陳柔縉則以為係經營不善，連橫的朋友林申生認為，「緣該報社之組織不健全，非清吏向日人抗議之結果；日人特聽其自生自滅耳」。另一位和連橫親近的門生張振梁則認為連橫創辦該報的原因，「乃其時台局粗定，日人招徠台人故」。說見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2009 年 10 月 12 日讀取，此地為轉引。而連震東的說法，則以為該報「鼓吹排滿」。時同盟會同志在南洋者，閱報大喜，派閩人林竹痴先生來廈，商改組為同盟會機關報。嗣以清廷忌先生之言論，飭吏向駐廈日本領事抗議，遂遭封閉。」連震東，〈附錄連雅堂先生家傳〉，參見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1051-1058。本文檢尋報刊所獲的資料與以上兩種說法，概不相同。筆者此地的說法係以同時代的文獻資料為依據。

曾迺碩《連橫傳》謂雅堂學養豐富，主漢文部，「自是勝任愉快」³⁰，這是不錯的，但也有可能是，它缺乏挑戰，而且漢文部有其既定的格局，例如《臺南新報》有幾個專欄，「翰墨林」報導文人雅集等活動、「藝苑」為主題徵詩、「文壇」為祝賀之文辭、他人詩集序辭、祝壽文辭等等。《臺灣新聞》漢文欄亦大同小異。身為筆政，連橫的權限非常地有限。再加上是殖民政府的機關報，處處在被監視之中。因而，所謂「雅堂主持日報漢文、詩、古文辭，筆健、氣雄、情濃，為讀者所歡迎，欣賞醇厚人情味風格」³¹云云，恐怕都是揣測之詞。以今觀之，連橫對於主筆日本官方報紙，只負責漢文部，並不感到滿意。否則，何以說明連橫非得自己創《詩薈》不可？

從黃欣（茂筌）〈劍花歸來再主南報賦此以贈〉一詩中，我們進一步印證連橫主筆政並不能盡用其才，充其量只是為人所役使的看法。他說：「一代才華信有餘，梁園無地借相如。關河到處難為客，風雨中宵且著書。太史自稱牛馬走，伊人宛在鷺鷥居。江湖我亦扁舟侶，擬買青山共結廬。」³²詩裡推重連橫的才華，歎惜他並未遇到像梁孝王這樣的知音，連找到像梁園這種棲身的地方都沒有，簡直是司馬相如的翻版，只能四處為人馳走勞碌擔任筆政一職，不如便學范蠡退隱於江湖吧！這首詩對於連橫再主《臺南新報》並無喜賀之意，可見承乏報務，在友朋眼中，並未實現連橫的志意與才情，多少也折射了連橫對此事的看法。

或者可以這樣說，與日本報紙、政府當局關係良好的連橫，籌辦《詩薈》、《福建日日新報》代表著「受制約」心靈（不同於「被俘虜」的心靈）的異質呈現，暨其不願永遠維持為他人作嫁的身分——主筆政而已。《詩薈》創刊於1924年2月，至1925年10月停刊，共刊行22期。創刊的理由很簡單，《詩薈》發刊序作了明白的說明：「不佞詩壇之一卒也。追懷先德，念我友朋，爰有《詩薈》之刊行。」³³是故，《詩薈》發行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追懷先德，將前人之遺稿、遺書陸續刊登，

³⁰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頁37。

³¹ 同前註，頁38。

³² 黃欣（茂筌），〈劍花歸來再主南報賦此以贈〉，《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8。

³³ 連雅棠，〈臺灣詩薈發刊序〉，《臺灣詩薈（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

如孫元衡《赤崁集》、林衡之《東寧紀事》等。二是念我友朋，振興現代文學，也就是刊登時人的作品。在《詩薈·餘墨》五號，有更進一步的闡釋：「不佞之刊《詩薈》，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³⁴刊登內容有「詩鈔」、「詞鈔」、「文鈔」、「詩存」、「文存」、「詩話」、「詩哇」、「謎捲」等專欄。此外，「騷壇紀事」發布各詩社往來、活動消息；「餘墨」，作用則為刊物「補白」性質，字數不多，但內容豐富，黃得時以為「篇篇無不雋詠可頌」³⁵。「尺牘」則是以讀者投書，多為連氏之朋儕。綜而言之，連橫有感於時代新舊遞嬗、漢學式微、國故教育未成，因而奮志底成，旨在藉此提振臺灣文運，以詩「興」、「觀」、「群」、「怨」的詩教之功，發揮蹈厲，挖揚臺灣詩界之天聲。這樣看起來，《詩薈》的營利意圖不明顯，而以保存文學史與同仁聯誼為主。

《詩薈》停刊的理由，也很簡單，表面上看，固然是連橫年四十八歲，擬赴杭州西湖靜養，無人承辦，遂告停刊；但可以想見的是，該刊既無積極營利的意圖，亦無相關規劃，維持不易似也是必然的結果，只好在遠行的計畫中被放棄。無論如何，期刊不易維持是極其明顯的。

雅堂辦《詩薈》、《福建日日新報》有其一定的時代意義。在二、三〇年代，海峽兩岸出現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報紙雜誌成為知識的主要來源。有意見而打算宣揚其意見、發揮影響力的文人，就自行辦報，來貫徹他所欲推動的文化理想，³⁶如1905年由同盟會所創的中國《民報》，以通過籌款方式辦報紙。日治臺灣的五十年間，為了同化臺灣人，日本人官辦或私辦的報紙、雜誌，力量龐大，臺灣人自行辦報紙、雜誌，已不只是貫徹主張而已，更在許多地方發放「抵殖民」的信息，而日本政府厲行檢查政策，使得許多版面出現禁刊的方塊，更是殖民與殖民抵抗正面交鋒的標記。

綜上所述，在殖民統治下，連橫與許多他的同時代文人，都有著被殖民現代性

³⁴ 連橫，《臺灣詩薈·餘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90。

³⁵ 黃得時，《臺灣詩薈·臺灣詩薈與連雅堂先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

³⁶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279-280。

制約的心靈，但內在蠢動於其中的「異質」召喚，意圖以傳播漢學為己任，為自己在人世中打造一條有所作為之路，不僅使他創刊《詩薈》，也辦理了雅堂書局。

（二）廉價發兌讀書經驗——雅堂書局的開設與停辦

日治時期的臺灣書局，以今日觀之，依其性質，應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文人書局，另一種則是商業書局。前者如「雅堂書局」、「興漢書局」、「文化書局」等；後者如「蘭記書局」、「玉珍書局」等。雅堂書局號稱與蘭記書局齊名，本節便以蘭記做為參照，略及其它書局，檢視雅堂書局的創設過程。

在進行兩者的比較時，論書局的規模、開設時間的長短，出版圖書的多寡，雅堂書局實在無法與蘭記相提並論，知名度卻不小。其所以如此，應係連橫個人聲望所致。

1926年，《詩薈》停刊，連橫二度舉家移居杭州，次年回臺，他並未記取失敗的教訓，仍然投身漢文化的傳播事業，與友人黃春丞（潘萬）合資，開設雅堂書局。雅堂書局位於太平町三丁目（今臺北市延平北路），次年搬移鄰近新屋，唯位址難以確定。書局成立時間，有1927年秋、1928年的不同說法，以前者為近是。雅堂書局開設前，報刊曾做預告，並敘述連橫旅居臺北過程與著述情形（連氏於1919年移居臺北），「臺南連雅堂氏，潛心述作。既刊《臺灣通史》，又偏（編）《臺灣詩薈》，以啟發臺灣文化。今歸自武林，因以三十年讀書之經驗，籌設雅堂書局於市內太平町，選辦古今有用之書，廉價發兌……」³⁷。該局原擬七月十日開幕，後因印工同盟罷工延至十五日，期間，連橫並以「雅堂書局」為題，徵求詩鐘，以為開張紀念³⁸，任臺灣總督的田健治郎特題「名山絕業」，臺灣銀行董事長中川白雲題「文獻可徵」。此外，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真、《臺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均為他撰寫序文。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到連橫的人脈，他與報社或日本政府的關係是相當好的，可見他自謂在報社「所往來者，多屬

³⁷ 本刊：〈雅堂書局將出〉，《臺灣日日新報》9734號，1927/6/4，頁4。

³⁸ 本刊：〈雅堂書局徵詩〉，《臺灣日日新報》9771號，1927/7/11，頁4。

本刊：〈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9800號，1927/8/9，頁4。

一時之士」，並未誇大。儘管不乏矚目者，但書局的經營歷史與《詩薈》的命運差不多，應該未超過兩年，十分的短暫（1927-約1929）。³⁹結束後，黃氏另開三春書局。

連橫為什麼要開設書局？這與他個人購書的經驗，或者不無關係，在《詩薈餘墨》裡，他檢討漢文圖書流通的情形，頗有嘖言：

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所售之書，不過四子書、千家詩及二三舊小說，即如屈子楚詞、龍門史記為讀書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臺，無處可買，又何論七略所載，四部所收也哉？然則欲購書者，須向上海或他處求之，郵匯往來，諸多費事，入關之時又須檢閱，每多紛失；且不知書之美惡，版之精粗，而為坊賈所欺者不少。⁴⁰

不佞自十年來，擬集同志組織讀書會及圖書流通處，一以鼓舞讀書之趣味，一以利便讀者之購借，而呼遍全臺，無有應者。文運之衰，寧不慨歎！⁴¹

但是，開設書局的動機只爲了自己的需要或服務像他這般少數的讀書人嗎？自然不是的。「選辦古今有用之書⁴²」，以供市場流通，傳承漢文知識，或方爲主要的目的。

雅堂書局開店的第一年，曾聘雇張維賢擔任店員，打理店內事務，直到第二年，張氏負笈東京，入築地小劇場學習爲止。由於有聘雇的經營，應可以確定雅堂書局有營利的企圖。但實際的營業情形，因無客觀文獻記載，並未遺留相關的具體資訊，我們只能從其後人的回憶以及當時其他書局經營的片段，略窺端倪。

進書部分，一般稱從上海的中華、民智、北新、文明、世界、泰東、千頃堂、掃葉山房，以及商務印書館等書局進購。唯成本頗高。雅堂書局鬻書紀錄並無留存，遂無法進一步掌握其進口圖書的細項，因而，便難以推估圖書種類，類似情形，還

³⁹ 雅堂書局開設時間，有1927年秋、1928年之說，前者爲書局合夥者黃春丞，後者爲連震東的雅堂先生年表；雅堂書局應開辦於1927年7月10日，報端披露如下：「本市連雅堂與黃春丞氏合開雅堂書局，籌備以來漸已就緒，擇地于太平町三丁目。爲往來衝要之區，卜于本月十日正式開業。」本刊：〈雅堂書局開矣〉，《臺灣日日新報》9766號，1927/7/6，頁4。

⁴⁰ 連橫，〈詩薈餘墨〉，《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306。

⁴¹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291。

⁴² 本刊：〈雅堂書局將出〉，《臺灣日日新報》9734號，1927/6/4，頁4。

有蔣渭水的文化書局（1926-）⁴³。目前，惟一可以做的，或者從書局性質與之接近的「興漢書局」，略窺一斑。張純甫致力蒐羅各式漢學典籍，或者供個人珍藏閱讀，或者在他開設的「興漢書局」販售，今日可見〈守墨樓藏書目錄〉三本手稿中，黃美娥獲張純甫哲嗣張子唐借閱影印，因而觀其藏書之豐富，遍括經史子集四部，如《十三經注疏》、《御纂七經》、《四書古註群義》十種、《百子全書》、《集林》、《漢魏百三名家集》、《唐詩百名家集》、《漢魏叢書》九十六種、《二酉堂叢書》、《國朝著述叢編》、《顧亭林遺書》、《唐人說薈》、《清人說薈》、《清人說薈二集》……等。影本現存新竹文化局文獻室。若以相類的書目推論，則其圖書種類較缺乏多樣性。

經史子集的漢文線裝書，是雅堂書局販售的主要圖書。以這些書籍種類，想必經營不易，因而書局當時也兼營文具，賣湖筆、徽墨、宣紙、雅扇等。爲了吸引客源，甚至舉辦冬季折扣，如《日日新報》所載：「古今圖書。照碼九折。新舊小說。照碼八折」⁴⁴。雖然標榜不賣日文書籍文具，卻又代理臺灣總督府採購有關南方資料的漢文書籍業務，爲林元輝歸類爲御用書店。⁴⁵但即使如此，雅堂書局仍無法維持。

比起雅堂書局的專注於經史的漢文圖書，雲林斗六人黃茂盛（字松軒，1901-1978）開設的蘭記則明顯不同。陳江山《精神錄》的扉頁廣告這樣描述他對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理念：

竊願世之有志者，以實心求實學，俾古今聖經賢傳，物理科學，靡不了然於胸中，然非博覽群書，何由而得此。⁴⁶

「實學」是蘭記的目標。黃茂盛深諳管理，書局從事多角化經營。他販賣二手書籍、

⁴³ 文化書局的開辦，報端披露如下，「臺北爲臺灣之首府，爲全島民衆聚會之區，而至今尚未有本島人經營之書店，爲臺灣文化向上計，甚爲遺憾，特以中國出版之漢文……。」

本刊：〈文化書局出現 蔣氏倡辦〉，《臺灣日日新報·時事》9371號，1926/6/6，頁7。

⁴⁴ 本刊：〈書局冬季大賣〉，《臺灣日日新報》9911號，1927/11/28，頁4。

本刊：〈讀書之時到矣〉，《臺灣日日新報》10625號，1929/11/15，頁4。

⁴⁵ 林元輝，〈以連橫爲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1998），頁8。

⁴⁶ 轉引自江林信，〈漢文知識的散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603。

創立「漢籍流通會」，酌收會費，倡議圖書交換閱讀，並且是當時漢文教材的出版商。他以人文與科學並重的原則自編「漢文讀本」。爲了持續經銷漢文書籍，曾經出版過一系列日語教材書籍，諸如《無師自通日文自修讀本》、《ペン字入實用書翰辭典》等。⁴⁷

與雅堂書局一樣，蘭記也進口圖書方面，但更有策略。其初期爲郵購，後則與上海之間的書店建立「圖書託售」的合作關係。在進口圖書的選擇，也更具彈性，種類繁多的各式圖書來自上海商務印書館、鴻文新記書局與千頃堂等書店，經、史、子、集固然在列，三〇年代之後，更有大量中國通俗小說，諸如《官場現形記》、《孽海花》、《啼笑姻緣》、《漢宮春色》等，符合大眾休閒品味的書籍提供選購，充分反應對時代需求。此外，醫藥、催眠、相術、魔術，甚至連環圖書、理財致富，美術圖片等，都在經營範圍。有鑑於當時蔘蘭風氣的興盛，黃茂盛更利用其日文能力，開闢日本內地的苗圃市場，以郵寄方式在日本的「園藝趣味社」，刊登「蘭記種苗園」之廣告，宣傳其經營的項目，包括「和洋蘭諸盆栽」、「大葉報歲蘭大量栽培」。⁴⁸蘭記重視現代商業的經營手法，更表現在它對廣告的重視，不僅在各大報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民報》、《三六九小報》、《詩報》等，刊登廣告，廣告詞的設計更是別出心裁，如對《拳乘》、《拳經》與《少林拳術精義》等書的宣傳寫道：「殺人不眨眼之驚人絕技公開於世」等。⁴⁹

蘭記在擴充過程中也遭遇過打擊，其一是昭和二年（1927）年間，引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國語教科書》，因出現「國語」字眼而遭殖民當局查禁。⁵⁰其二則是在昭和九年（1934）二月十日，慘遭祝融之災⁵¹。但由於經營得法，觸角多元，兩者都未對蘭記產生致命的威脅。蘭記並且自製圖書分類與書目，別具建構時人知識論的時代性意義。⁵²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何義麟，〈祝融光顧之後——蘭記書局經營的危機與轉機〉，《文訊》255（2007），頁 68-74。

⁴⁹ 蔡盛琦，〈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文訊》255（2007），頁 75-82。

⁵⁰ 蔡盛琦，同前註，頁 75-82。

⁵¹ 何義麟，〈祝融光顧之後——蘭記書局經營的危機與轉機〉，《文訊》255（2007），頁 68-74。

⁵² 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的閱讀／知識故事〉，《文訊》255（2007），頁 57-64。

從雅堂書局的經營與蘭記作比較，多少能發現前者經營短暫，最後不能免於失敗的原因。類似連橫這樣的文人雖然掌握文化資本，卻由於被自身的理想性所局限，易流於曲高和寡的窘境，或者未能掌握文化資本如何擴張、轉化為商業市場中的經濟資本的原則，以致於只好黯然收店。

不安於日人報刊筆政的位置，刊行《詩薈》，經營書局，可以看到連橫投入漢學知識生產、傳播、求為世用的熱情，不妨視為被殖民者心靈異質的展現，其過程頗為曲折。由於無法和同於閱讀市場，兩者都不能避免地走向曇花一現的命運。

三、知識生產的原型與變形——詩社與漢學研究會

在報刊與書局的經營外，連橫與漢學知識的關係，還有詩社與漢學研究會。

書房與公學校的消長具備文化認同的抗衡意義，對此，前人的研究頗多。當代表漢文化認同的書房的形式逐漸被殖民者所摧毀時，這股力量何去何從？本節將透過連橫的詩社、漢學研究會的參與，說明臺灣民間抵抗殖民文化力量的移防過程，以及日治時期傳統文人求為世用的熱情行動暨其頓挫的下場。

（一）從詩事風雅的創造到消費——詩社的興盛與變遷

當殖民統治的形制趨於穩固，地方教育便與殖民者國家機器產生功能抵觸的局面，遂成為殖民者積極以各種措施直接管束、控制的對象：1899年統治當局政令宣導中，認定臺灣舊有「書房」⁵³等私人教學場所，應當改易為現代文明教育制度的「臺灣公學」，於是，傳統教育場所在官方以教學科目、教材與登記註冊等處處刁難的情況下⁵⁴，逐漸難以正常發揮傳播漢學與民族精神的既有功能；而且由於公學

⁵³ 據汪知亭《臺灣教育史》，臺灣教育制度於清領時期，主要有：儒學、書院、義學、社學、民學、新式學校等形式。其中，「民學」即是民間的私學，俗稱書館或私塾，臺灣民間則多稱之為「書房」，係日本領臺之後唯一被保留下來的教育機構。

⁵⁴ 相關「刁難」情形，如：思想改造（1899 書房教師講習會）、教材限制（1905 編成漢文讀本），並

校的普及，就讀率升高，故書房朝向午後乃至夜間開課的狀況也日漸普遍，1904 年時，已有直接稱書房為「夜學」者⁵⁵，亦即臺語所謂的「暗學仔」。可見，書房的邊緣化趨勢已不可免。1905 年後，書房教材愈受控制，必須獲得政府許可、受到法律規範，已無法保留傳統的教學內容，自 1914 到 1922 年書房由 638 所銳減為 94 所，這種近乎銷亡的非常態現象，意味著支持傳統教育的社會力量已如官方預期地在幾年內逐漸解體，因而當局毋庸忌憚，於 1922 年頒布「臺灣教育令」（敕令第 20 號發佈），公告公學校漢文課改為每週兩小時的選修課，而且各地方得以視實際需要自行廢除漢文課。⁵⁶如是做法，表徵殖民者已由初期的管理手段，進入實質的禁止階段，而傳統書房之於淡出歷史舞台，已係大勢所趨。

由於書房沒落，詩社遂擔任起書房的部份功能，因而普遍地被認為這是詩社增加的原因之一。當代學者如王文顏以降，多做這樣的持論⁵⁷。查檢資料，確也可以獲得相應的證據，如臺北州便有不少詩文社具備書房的性質，陳廷植之聚奎吟社，執行教授子弟識漢字、讀漢文的教育任務。而這樣的看法，多少受到連橫的影響，連橫在詩社記裡寫道：

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後先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文運之延，賴此一綫，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⁵⁸

將詩社視為臺灣文運的延續者，是民俗之所繫者，其意在於詩社不僅是創造風雅之所在，也是社會風氣良窳的觀察點。這樣的看法，源自於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採風、

且官方大量利用輿論鼓吹書房廢除或改良為正確之趨勢的論點。

⁵⁵ 說見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1904 年即有「從來島人設立之書房，自禁止以來，大稻埕其他各地設立夜學多有出願者。稻埕亦已至有十校。此等書房，於子弟教養上無有弊害等事」，可知書房轉為夜間上課。」本刊：〈島人夜學續興〉，《臺灣日日新報》1824 號，4 版，1904/5/31。

⁵⁶ 王順隆〈日治時期臺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臺灣風物》49 卷 4 期，1992，頁 122-124。

⁵⁷ 詩社的發展，在日治時期頗有時日，這當然不是惟一的原因，黃美娥便以為這是當時內、外在因素輻輳的結果。外在因素有日人的推波助瀾、社會環境安定、報紙雜誌的傳播；內在因素有「沉溺詩歌以自遣、維繫漢文於一線」、「風雅唱和，切磋詩文」、「抬高身分、博取美名」、「溝通聲息、敦睦情誼」等，但筆者認為欲擔任地方漢文教育的功能應為主因。說見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204-233。

⁵⁸ 〈臺灣詩社記〉，《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 98-105。

觀風，這也是連橫在他對詩歌創作林林總總的意見中，一再表達的。

而連橫一生與詩社的關係，尤為深遠。創結詩社，實際上為連橫的漢學傳播事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連橫的作品中，頗多與詩友的酬唱；連橫也是少數於臺灣三大詩社都有交遊的詩人；他直接經歷了詩社的興衰。簡單綜括連橫的詩社經驗，大致是這樣的：他從上海返臺，與陳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青等結浪吟詩社，人數約為十人左右，一個月裡有幾次聚會。每次聚會時，一定作詩；在特殊的日子裡，他們也會集於城外竹溪寺、法華寺、海會寺這些廟宇。後由於老成凋謝，始丙午年冬，連橫又與瘦痕邀趙雲石、謝籟軒、鄒小奇、楊宜綠等，改創南社，約十多人，迨己酉間，成員已達數十之譜，並推蔡玉屏為社長。「辛亥春，（南社）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全臺之士至者百人」，已具相當規模。另外，同樣是己酉年，連橫「居大墩，癡仙邀入（櫟）社，得與諸君子晉接，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櫟社，為林癡仙所倡，「賴紹堯、林南強聞其志而贊之。啟運、槐庭與呂厚庵、傅鶴亭、陳滄玉復和之，遂訂社章，立題名錄，為春秋之會。」櫟社成立廿二年後，「癡仙、紹堯、厚庵、啟運、滄玉雖前後徂逝，而林灌園繼起，鶴亭、南強、槐庭俱健在，建碑刊集，以紹癡仙之志。」櫟社依然展現相當的活動力。當時，臺北為全臺首府，而瀛社為之主，此係洪逸雅、謝雪漁、倪希昶等所共創，社員幾及百人。瀛社後來與新竹之竹社、桃園之桃社，互相聯合，時開大會。連橫移家淡北，便經常與瀛社諸君子往返。以上所記，均見於連橫的〈臺灣詩社記〉，與臺灣三大詩社的交遊經驗，應係他撰寫「詩社記」的基礎，為臺灣文人交遊留下可貴的文獻資料。

然則，詩社一直被視為漢學傳播中的要項，在日治時期，具有一種「鈕扣」(button)的功能，維繫著臺灣傳統文人的內在居室，以及他們的自我敞開的行動。就中國文人傳統而言，文人的身分為四民之首，他們自幼傳習經典與詩文的創作技藝，及長，懷抱經世治人的理想，備受社會尊崇。由於學問養成不易，這個身分的「流入」是有限的。但到了日治時期，文人的身分卻不得不向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變得多元化起來，連碾米廠的夥計、藥行的老闆都是詩仔會的成員，全是詩人；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們並未故步自封，而是摸索著去建構一個較適應於現代存在情境的主體性，開創幾近四百個詩社，成就漢詩的一頁璀璨。這絕對不是徒然閉鎖所能竟其功的。

閉鎖使得文人保有舊風雅，敞開卻有可能使文化開出新光華。我們再仔細觀察，傳統文人求為世用，繫民俗為己任，從連橫〈櫟社大會示同社諸子〉這首詩，便可以略窺一、二：「寥落吾徒未有奇，孤芳獨抱一編詩。廿年舊淚傷鋤蕙，千古高風繼採薇。裙屐漸欣鄉國盛，文章足起劫塵衰。莫談櫟社終無用，佇看輪囷拔地時。⁵⁹」由此可見，櫟社之櫟，原是以無用為大用，其目的，在期望以文采修辭為職志的詞章學問，能於世變的大劫之後，再綻新光輝，能夠有一番大作為。

因而，傳統文人創辦刊物、徵求詩作，以發稿費、獎品、獎狀，提供食宿等等誘因，透過組織化的積極力道來推廣漢詩。前文曾提及連橫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時，辦理「赤城花榜」之藝旦花選，明白的說，目的就在於「應風流文士之催，或吸引讀者乎！」⁶⁰為的是增加寫詩的人口，提升漢詩活動的能見度；另一方面也將漢詩商品化，成為可買賣的對象，正式嵌入現代社會中消費的一環。活動場所反映出詩歌吟詠已不再是傳統士大夫集團於名園樓閣的專屬活動，它廣泛的出現於社會的各個角落，舉凡歌舞宴會場合、紙醉金迷所在，販夫走卒之處，攤集市肆之地，均可見其蹤影。其活動，也不再局限於風雅，而是具備社交性質的媚俗應酬活動，如歡迎洗塵會、公餞壯行會、悼亡慰安會、祝賀表彰會、婚嫁祝壽會、開業紀念會等，或是為雅興之納涼會、觀月會、觀菊會、觀蘭會等，以及祭孔之會等。⁶¹

這種變化，使得即使是像連雅堂這樣的文人，都感到世風日下、斯文淪喪，漢詩究竟是否得維繫風俗之盛衰呢？且不說張我軍大張旗鼓地反對擊鉢，連橫對此也持保留的態度。《雅言》裡說：

三十年來，臺灣詩學之盛，可謂極矣。吟社之設，多以十數。每年大會，至者嘗二、三百人。賴悔之所謂「過江有約皆名士，入社忘年即弟兄。」誠可為今日詩會讚語矣。顧其所作者，多屬擊鉢吟。夫擊鉢之詩，非詩也。良朋小集，刻燭攤箋，鬥捷爭奇以詠佳夕，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日卑而詩之道墜矣。然而今之詩會非擊鉢吟無詩，今之詩人非作擊鉢吟之詩非詩，

⁵⁹ 連橫，〈櫟社大會示同社諸子〉，《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55。

⁶⁰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頁73。

⁶¹ 江寶釵、謝崇耀撰，〈從瀛社活動場所觀察日治時期臺灣詩社區的形成與意義〉，「瀛社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8），頁2。

是則變態之詩學也。可乎哉？⁶²

連橫認為擊鉢詩「可偶為之不可數」，把「非作擊鉢吟之詩非詩」的現象，逕呼之為「變態」之詩學，其內心之沉痛可知。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風氣所至，無人足以擋之。總之，漢詩書寫在殖民政府利導之「印刷資本主義」之下，其抒情言志之功能，似有渙散之趨勢，新的美學標準正在取而代之。文人生活方式的消逝，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漢詩美學的轉變。當漢詩美學的轉變再也無法彌平它自己與生活現實中言文不一致的鴻溝，也就是說，它的通俗化並無法維繫漢詩日常語用與被閱讀的教化功能時，轉為一種僅具審美意義之技藝，它遂成為類似如插花、彈鋼琴的非必要性能力，漢詩便不可避免地步入衰微的命運。此係創結詩社終究無法承載傳統文人自我敞開之實踐的原因之一。

（二）交混殖民性與現代性的漢學研究會

在創結詩社之外，漢學研究會亦曾投入漢學知識傳播與生產的行列。連橫在開設雅堂書局之前，曾積極參與夜學。1930年，《三六九報》主辦「臺灣三百年史講演會，十一月二十日迄二十九日，每日7-9時，在臺南公會堂講演……」⁶³。雅堂書局開設之後，連橫成立「漢學研究會」，每晚7-9時，於書店內研讀漢文⁶⁴，大抵亦為夜學之類，其為書房的性質，十分明顯。

以此判斷，漢學研究會係一替代書房的組織。它的出現及作用，還必須回到臺灣傳統的教育制度進行說明。

自清代領臺以來，中國教育制度被移植到臺灣，因地制宜，只做了極少數必要的改變。其部份形態是，透過對地方自主權的承認與放任，讓地方士紳肩負起社會維繫的責任，民學、書房、義塾等教育形式，即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產生的，這是地方教育與鄉治社會深刻綰連的結果。它們在早期只有義塾進入官學體制，但很快地即轉為私學。這些私學無特定組織、也無特定的系統，充其量只能稱之為教育場所。

⁶² 連橫，《臺灣語典；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1。

⁶³ 《三六九小報》，1930/11/13，頁1。

⁶⁴ 本刊：〈漢文研究會再開〉，《臺灣日日新報》10555號，1929/9/5，頁4。

它們在科學、官紳體系的推引下，以不成文的沿襲方式，用內容相似的教材，延聘背景一致的教師，為地方子弟教學，這些教育場所廣布民間，發揮了啓蒙民智的功能，成為實踐傳統教育的重要力量。日治臺灣的教育，大抵遵循後藤新平訂定的方針：「統治之根基，在國語之普及與國民性之涵養。」國語學習的實踐點即為中、小學校，其措施為漸進。初期，由於一時無法掌握被殖民者的語言與教育系統，對書房並無管制，更倡議詩社的成立，表面上允許臺人漢文的研習。針對殖民者這方面，則設通譯，施以被殖民者的語言教育，以利溝通，特別是直接與民眾接觸的警察階層、語言教師等——通曉部分台語，是必需的，因而也有針對此一目的而出版的書籍，如川合真永的《笑話集》⁶⁵即因此而編纂。其後，漢文與日文漢字的重疊，也使得殖民者在進行被殖民者的語言改造中出現一定的功能，有關這部分，論者甚多，而以陳培豐為代表，此地不贅。⁶⁶其實際則雷厲執行殖民地的國語學習，引進西方教育制度，1895年臺北市芝山岩設置第一所西式教育場所，翌年在全臺灣創立國語傳習所，1898年，國語傳習所升格公學校，大力掃除文盲。⁶⁷

為使教化更為深入民間，在學校常規教育下，日府另行設立同風會、同化會、風俗改良會、敦俗會、矯風會、興風會、尙風會、主婦會、青年會、同仁會、共榮會、向陽會、讀書會等。儘管各地名稱不一，卻維持著聯合組織的形式，分州、郡、市、街、庄各級。如深坑庄同風會成立，各設國語（日語）練習會，教授國語（日語）⁶⁸。1925年文山郡聯合同風會之下，深坑庄同風會會址設於庄役場，會場由庄長劉軟綢擔任，組織包括主婦會、戶主會、青年會、處女會。而「淡水郡同風會」，也會借用淡水公學校講堂（1925），舉辦「活動字真映字術講習會」。一方面是強制的，一方面則在潛移默化中，進行同化教育。凡上述各色組織，最後多數轉化為

⁶⁵ 川合真永，《臺灣笑話集》（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堪稱臺灣第一部台語笑話集。

⁶⁶ 此即所謂的「同文主義」。陳氏關心的是同文主義與同化於文明（現代性）的關係，而這裡只想指出同文主義對殖民地社會組織再造是有所作用力的，對於語言政策、以及印刷所涉及的現代性以外的相關問題，限於篇幅，無法再詳做說明。參考氏著《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

⁶⁷ 有關本時期的教育政策，請見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商務，1978），頁45。本段為轉引。

⁶⁸ 林能士總編纂、毛知礪等撰稿，《深坑鄉志》（臺北：深坑鄉公所，1997），頁7。

國家之行政末端組織。⁶⁹類似漢學研究會這種新式漢學教育社團的諸多名稱⁷⁰，是緣起於同樣以教育為功能，但方向完全迥異，以日本化為主的新式教育組織，如和漢文研究會、夜學會⁷¹都是當時普遍的同化教育組織。

日府在設立學校之外，尚且打壓書房，如 1922 年當局二度頒布的「臺灣教育令」⁷²，進而加以改造為同類，又與許多外圍教育組織相輔相成，使得臺灣民間維繫傳統漢學力量時備感吃力，許多傳統知識與殖民性、現代性交混的現象於焉產生了。傳統文人受任為地方領導階級，必須與之妥協，如對公學校的捐輸，送子弟入學，擔當為殖民教化宣傳之組織的成員，乃至成為領導者，例如早期的新學會、後期的同風會、青年會等，受邀為會長，但在這一方面的發展之外，另一方面，他們又時時刻刻都在尋找維繫傳統文化的方式，如公學校初期與地方仕紳妥協，增設漢文科，敦聘地方具名望的塾師入公學校教授相關科目，麻豆振文社在 1925 年還有試圖介入公學校漢文科落實的紀錄。在對同化社團的滲透，如最初發起於臺南與臺北的「新學會」，試圖將漢學融入日本化的主要脈絡中。同風會、青年會的授課內容亦未必皆為日本化之內容。同風會的劉蘭亭會長、許梓桑、蔡敦輝講師都是志在維繫傳統的人士。文化協會甚至透過部分可以掌控的青年會傳播本土思想，可以謂之為假借日本化組織之名，卻行漢學深化工作之實，這可以解釋何以日本同化的新式社會組

⁶⁹ 宋秀環的〈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原住民青年團的發展〉一文指出，日本政府便這樣改造原住民青年團，在對部落青年組織的支配關係外，也進一步地迫使之成為國家的末端組織。見《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3 期（2004.06），頁 2-23。又，楊境任也指出，在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後，青年團體方始大幅的成長，其中臺灣文化協會的積極參與引起當局的憂慮，有感於必須控制青年團體，因此也開始以間接和直接的方式介入，間接是由官方經營的教化團體或青年會館來控制青年團體；直接則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範青年團體，因此受文化協會影響，臺灣的青年組織乃進入「青年團行政的整備與系統化（1926 年至 1938 年）時期」，並在 1930 年由總督府頒布〈臺灣青年團訓令〉，官方全面地對青年團進行統制。見楊境任，〈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⁷⁰ 所謂「新式」指以較新潮的命名，有社團組織的形式，開辦演講，向外公開，而且可能還擔任書籍流通的任務，蘭記、雅堂書局都有開辦漢學研究會的記錄，與書房只針對地方童蒙教育形式不同。

⁷¹ 1905 至 1906 年間，總督府要求公學校設置「國語夜學會」。以學校及派出所為單位，半強制招集未就學的青少年，每天晚間由教職員或警察義務教授國語。

⁷² 日治期間，「臺灣教育令」一共頒佈三次，分別是 1919 年、1922 年和 1941 年。其中，1922 年的「臺灣教育令」因明令「漢文」為選修課，故引起有志之士群起抗議。

織雜廁於漢學研究組織之中。不過，比起同化組織的五花八門，漢學研究組織仍屬九牛一毛。

「臺灣教育令」一出，群情嘩然，臺民一方面投書報社訴諸輿論，要求恢復漢文，另一方面，則改變書房的上課時間來加以因應。為避免與日間上課的「公學校」相衝突，乃迂迴延至夜間開課，此即俗稱的「暗學仔」。

原本，民間書房在殖民政府的政治力操作之下，於 1922 年銳減至極，但相關社會力量並未隨之銷解，反而因為頒發「臺灣教育令」的危機意識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逐年減少的書房數出現上升的現象，並表現在三個方向：其一為書房的重新振作，據統計，於 1923 年起至 1930 年間，書房數量自 94 所微幅增加至 164 所，統治當局為壓制此一趨勢，政府的約束益為嚴厲，1923 年，書房被要求教授日語、修身、算術等公學校的課程即是明證；⁷³其二是詩社等藝文組織取代了傳統書房的位置，關於此一部分，已見於前節之論；其三，以社團組織形態出現，書房名亡而實存。如在風氣較為保守的麻豆、宜蘭兩地都曾出現過的振文社。振文社，不以書房為名，卻沿襲清代文學社團的名謂，以漢文研究與教學為主。

為免當局忌諱、兼以時勢潮流之所趨，傳統私學使用新式組織名稱者居大多數——漢文研究會即其中之一。雅堂書局成立後的漢學研究會，其存在的目的亦同。漢學研究會以同化社團的名謂出現，或旨在掩當局耳目、混淆殖民者的視聽，或隱含與之一較高下的競爭意圖，或僅係耳濡目染、借用其名謂而已。總之，書房的名謂既然已經備受約束，那麼，借用同樣具有教育功能的社團名稱以為己用，再標明漢文、漢學以作為與日本化新式教育組織的區隔，強化對社會的號召力⁷⁴，不能不視為一合理而明智的發展。

當時這些具有傳承漢學文化的教育組織，不論是採用何種新式社團名稱，究其實質內涵，上課內容，一以儒家經典為修身之本，而實際傳習的技藝則為寫詩作文，至於上課時間，則一概都在夜間，可見這些組織的名相略所不同，但內容實為一致，在形式上則與傳統私學不同——它們鼓吹漢籍流通、辦理演講等活動，積極對外開

⁷³ 王順隆，〈日治時期臺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頁 122-124。

⁷⁴ 青年會也必須另立一組織，否則不易對具傳統認同的群眾有足夠的號召力。

放的程度，甚至刊登廣告，經營更為靈活，不妨以新式漢學教育社團統而稱之。新式漢學教育社團的發起者，有個人，也有組織。前者多係當地仕紳階級或私塾教師，後者則為支持傳統文化之組織。總的說來，仍以傳統仕紳階級進入的新社會領導階級所引領的組織單位為主。例如水社即是臺灣社會領導階級重要的組織⁷⁵，而大觀書院即是由傳統仕紳合力協成的義塾。對於當時這類社團的活動狀況，不妨參閱相關的報導，如輿論〈漢文研究會之活躍〉謂：「自改隸以來，教育制度既不注重漢學之振興，而公學校亦廢漢而不教，致現代之青年，於漢文之素養極其幼稚，然而漢文為臺民日常生活上所不可缺者」⁷⁶，以及〈各地既禁書房為備南洋南華進出公設漢文研究會如何〉、〈書房廢漢學興〉（1934）等，漢文研究會代替書房既有之功能與地位，似乎成為逐漸被接受的事實。

清代鄉治社會中由仕紳領導的教育機制，在臺灣播種結根，根深柢固，以致於傳統力量一時無以戢止，書房、詩社與漢學研究會的相始相因，正足以說明這股力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後又生」。而如前文所提及的，詩社也取代部份的書房的功能。不過，我們要注意幾個事實：國家機器的意識型態所建構的教育體制，以及它對違反其體制之相關組織的掃除，卻不是民間力量所能抗衡的。詩社的性質畢竟為同仁社團，以宴集聯誼，競藝遊樂為主，教育並非其主要目的，亦無具體的教育性格，其所能發揮的空間，很難不受到局限。另及，與官方對抗的，並不能簡化為只有公學校與書房兩股社會勢力，而書房與詩社間的消長關係，也不能僅就這兩者的數目計算而已。當詩社所存在著的書房內容已被殖民者改造，而且逐年消失，反彈僅為暫時的現象。在 1922 年後，大量出現的新式漢學教育組織，才是傳統精神與力量真正的集結出口，儘管它們並不能提高與公學校對抗的效果；但吾人若無視其存在，未能掌握其脈絡，則將無法詮釋傳統與殖民力量在教育領域上真實的抗衡關係與發展，自然亦無法清楚描繪出當時殖民與傳統力量在教育文化場域競爭的實際輪廓。

連橫在敞開自我以用世的過程採取了系列行動，包括了對詩社、夜學、雅堂書

⁷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 11-165。

⁷⁶ 〈漢文研究會之活躍〉，《臺灣民報》92 號，1926/2/4。

局辦理的漢學研究會等組織的參與，其展示的意義，不僅關係及臺灣傳統文人的志業與敘事，同時也埋伏著殖民權力的規訓企圖，以及現代性教育中要求言文一致的發展，三者相互角力，最後，自然是殖民政府的國家機器大獲全勝，現代性持續進展，文人落拓以終。不了解此，便無法進入臺灣傳統文人的存在處境與時代的脈絡。

結語

本文先說明日治時期的臺灣傳統文人的角色變動，漢文知識或孔孟思想皆不僅為收藏之用，而且為敞開以求世用的策略。接著以連橫為世變傳統文人的代表，追跡他從擔任報刊筆政，到參與詩社，開設書局，創辦期刊的過程，解釋何以連橫需要如此曲折地承接看起來並無密切關係的漢學活動，他的身分既是拾荒者、收藏者，更是一個敞開者、介入者。連橫所有的漢文活動，與中國文人傳統的經世致用理念，以及日治時期臺灣漢學的傳播與發展，息息相關。漢文閱讀在日治時期如何由書房、詩社，而書局，而與新式教育社團之間，有著承傳一體的關係。而每一個投入的腳步都不例外地代表著傳統文人向外敞開，他們立身應世的方式，都無法自外於殖民統治與印刷資本主義的消費——而展現為一和解、潰散的過程。此一過程在連橫身上表現最為明顯。

學者或將連橫在漢學傳播事業的挫敗，寬泛地解釋為恢復漢學傳統，與殖民地政策有所扞格，表面上看起來備受日人重視，卻並未獲得具體奧援，他在漢學傳播事業上一路顛躓，最後不得不以辭卸筆政、詩社流散、詩薈停刊、書局關閉、漢學研究會結束。反對者則以為連橫處處與日人合作，遂因為撰寫「鴉片有益」的言論⁷⁷被視為附和日本政府政策而大受撻伐，離臺赴滬，遠離臺灣。

筆者以為，連橫的挫敗，不只是他個人生涯的挫敗，更凸顯了數重文化意義。

⁷⁷ 連橫於1930年3月2日，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阿片政策謳歌論〉一文，坊間多稱之為「鴉片有益論」。

其一是，以出版現代性建構民族的想像共同體，不能阻止被殖民者心靈異質的活躍。其二，出版現代性的維繫，主要在於印刷資本主義。由於印刷牽涉巨大的資本，若沒有經濟實力的支持，則難以有所作為。連橫辦《福建日日新報》、《詩薈》、開雅堂書局的失敗，雖說也有複雜的政治因素，但他依賴捐款辦報，經營書局不如蘭記活潑、具商業手腕，無法獲得市場的回饋，代購日府用書亦無濟於事，恐怕才是主要的原因。

其三是「家世族望」左右社會地位的事實。連橫憑其揮翰成章的辭采，著述立聲，有名於當世，但其本質始終不脫為一介文士，他的祖父「連長瑞」雖以販煙致富，其家煙鋪及水田為政府當局所徵收，家業衰落⁷⁸，略無所謂的「家世族望」。並無「世家族望」，更無財貨，使得連橫難以成為晉身新建的社會領導階層，以致無法獲得雄厚的經濟資本作為其漢學事業的支撐。相反地，櫟社、臺灣文社，乃至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功，與霧峰林家諸君子的家世族望與經濟實力，實不無關係。

易言之，知識分子角色扮演的改變，使得僅有文學技藝的連橫已無法在社會新領導階層中晉身。知識分子必須被統治階層收編，或者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藝（如醫師）、經濟資本（如實業家），方足以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印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即班雅明、余英時所分析的當時知識分子的邊緣化。過去透過科舉以求晉身的徑路已不再，而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亦已為現代性進展中的殖民政權所改造與利用，則類似連橫這樣的文人，意欲透過詩社、漢學研究會等民間社會組織，用此維繫民俗，完成自我實現，有其現實上的困難，以致一再於各種嘗試的事業中遭遇挫折，而深切感到自我立身的困頓。

隨著政權的日趨鞏固，言文一致地日有進展，傳統漢學的市場漸趨於凋零，無法取得大眾的認同，這是何以連橫在漢學事業的傳播上，屢遭挫折，主要原因，仍在於經營不善。相對的，殖民教化日益多元而深入人心。在各地同化組織如雨後春筍，不斷新生，成為殖民教育體制中的內應，其中，卻也穿插著新式漢學教育組織的潛在滲透。此一現象，代表著傳統的知識力量積極於殖民地政權中尋找新的移防

⁷⁸ 「臺灣連氏家族」，big5.chinataiwan.org/zppd/MMWZ/200805/t20080528_650258.htm.2009年9月21日讀取。

位置。它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與殖民教育體系抗衡，其興起與頓挫，在連橫的漢文傳播事業中一覽無遺。

本文儘量使用一手資料，逐一檢討連橫所踐履的漢學傳播事業，說明其做為一個代表性的臺灣傳統文人，他在漢文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移動當中，與時代、社會的脈動若合符節之表現，彷彿時代與個人處境的相互依違，有時候完全出乎吾人的意料之外。

參考資料

（一）專書暨專書論文

江寶釵、李知灝，《全臺詩話：瑞桃齋詩話校注》導論，〈世變下吳德功的學思轉折——一個奠基於瑞桃齋詩話的考察〉（高雄：復文書局，2009），頁 1-58。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收錄於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出版，1999）。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書局，1959）。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商務，1978）。

林文月，《青山青史：連雅堂傳》（臺北：近代中國，1977）。

林能士總編纂、毛知礪等撰稿，《深坑鄉志》（臺北：深坑鄉公所，1997）。

林淇養，〈「副」刊「大」業：臺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初探〉，《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麥田，2001），頁 77-94。

林資修，《南強詩集》（臺中，林培英：1964）。

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臺北：臉譜出版，2002）。

班雅明著，王才勇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連橫，《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

連橫，〈臺灣詩薈發刊序〉，《臺灣詩薈（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

連橫，《臺灣詩薈·餘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連橫，《臺灣語典；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連震東，〈附錄連雅堂先生家傳〉，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9），頁1051-58。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

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

黃得時，《臺灣詩薈·臺灣詩薈與連雅堂先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梅家玲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204-233。

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er）著，馬雪峰等譯，《東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蔡相輝，〈從文人到國士——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收於楊雲萍、盧嘉興著，《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

賴柏舟主編，《鷗社藝苑》第4集（嘉義：鷗社印行，1955）。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1）。

（二）期刊

王順隆，〈日治時期臺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臺灣風物》49 卷 4 期（1999.12），頁 107-127。

何義麟，〈祝融光顧之後——蘭記書局經營的危機與轉機〉，《文訊》255 期（2007.01），頁 68-74。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總 25 期（2003.06.30）。

宋秀環，〈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原住民青年團的發展〉，《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3 期（2004.06），頁 1-23。

李秀娟，〈質問「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裡尋找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新」臺北〉，《中外文學》33 卷 3 期（2004.08），頁 39-61。

林元輝，〈以連橫為例析論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 期（1998.09），頁 1-56。

黃美娥，〈從蘭記圖書目錄想像一個時代的閱讀／知識故事〉，《文訊》255 期（2007.01），頁 57-64。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頁 81-119。

蔡盛琦，〈從蘭記廣告看書局的經營（1922-1949）〉，《文訊》255 期（2007.01），頁 75-82。

（三）報紙

謝雪漁，〈入報社誌感〉，《臺灣日日新報》2051 號，3 版，1905/3/7。

本刊，〈雅堂書局將出〉，《臺灣日日新報》9734 號，4 版，1927/6/4。

本刊，〈雅堂書局開矣〉，《臺灣日日新報》9766 號，4 版，1927/7/6。

本刊，〈雅堂書局徵詩〉，《臺灣日日新報》9771 號，4 版，1927/7/11。

本刊，〈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9771 號，4 版，1927/8/9。

本刊，〈書局冬季大賣〉，《臺灣日日新報》9911 號，4 版，1927/11/28。

本刊，〈漢文研究會再開〉，《臺灣日日新報》9911 號，4 版，1929/9/5。

本刊，〈讀書之時到矣〉，《臺灣日日新報》10625 號，4 版，1929/11/15。

本刊，〈書道頒布會 曹秋圃氏作品〉，《臺灣日日新報》10696 號，4 版，1930/1/26。

本刊，〈漢文研究會之活躍〉，《臺灣民報》92 號，1926/2/4。

劉魯，〈祝三六九報重刊〉，《三六九小報》322 號，2 版，1934/3/13。

本刊，〈島人夜學續興〉，《臺灣日日新報》1824 號，4 版，1904/5/31。

本刊，文化書局出現 蔣氏倡辦〉，《臺灣民報》，108 號，1926/6/6。

（四）研討會論文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大會手冊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主辦，2004.07.15-16）。

江寶釵、謝崇耀撰，〈從瀛社活動場所觀察日治時期臺灣詩社區的形成與意義〉，《「瀛社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8.11.1-2）。

（五）學位論文

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02）。

楊境任，〈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六）電子資源

[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檢索系統：<http://140.138.172.55/tang/Database/index.html>。

不著撰者，《大地》，2003 年第 9 期，<http://past.people.com.cn/GB/paper81/9356/867111.html>。

江林信，〈漢文知識的散播者——記蘭記經營者黃茂盛〉，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603。

不著撰者，《中國臺灣網／族譜／臺灣連氏家族》，big5.chinataiwan.org/zppd/MMWZ/200805/t20080528_650258.htm。2009 年 9 月 21 日讀取。

連橫，《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2009 年 10 月 12 日讀取。

